

洛阳墓志传奇

金石研究纠史谬

□王化昆 文/图

墓志石刻文字的研究工作,至宋代达到了历史上第一个高峰,并逐渐形成一个专门的学科“金石学”。学者们从文物、考古、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科学、军事、地理等广泛的角度,对墓志进行精研细究,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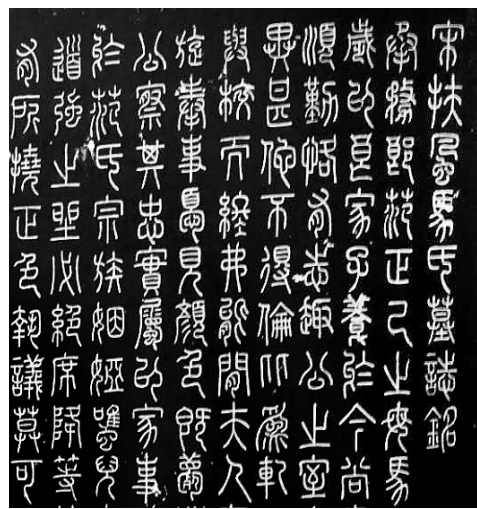
新出土的墓志资料,不同于传世文献书籍,由于它是全新的资料,埋藏于地下千百年,较完整地保持了原有面貌。传世文献,不知经过历代多少次的抄写转录,所谓“书写三遍,鸟焉成马”,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有些书在早期就已佚散,后人从其他相关书籍中,重新辑录成册,其本来面貌难得一窥,致使辑成本的内容倒置、重复、遗漏等错误层出不穷。

另外,像二十四史这样的正史,它的容量是极其有限的,所记载的仅仅是军国大事、知名人物,即便对一些贵族、大家族的记载也往往比较简单,甚至是只言片语。而且,传世文献有其与生俱来的问题:由于中国历来的传统,正史是由后世政府主持撰修的,他们是在击败或者篡夺了前朝统治者权力后建立的政权,难免夹杂了胜利者的思想和观点,在史料取舍上难免会受到世人的诟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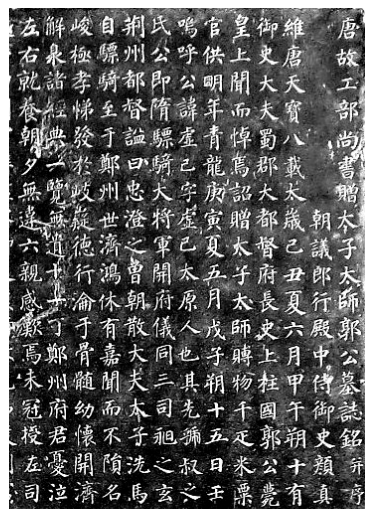
而墓志之类的金石文字,则有其特有的优势。其文字虽也多有读美之嫌,但只要我们能够去其浮词,去伪存真,透过现象看本质,会从中得到很多传世文献所难以看到的珍贵资料。而且单方墓志所记载的内容面小点大,仅仅是对一个人及其家庭展开叙述,自然会较为详细入微。史书中对某一事件可能简单地一笔带过,但因为墓志主亲历了此事,描写就会很细致。大量墓志所记载的人物、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很多在正史中都有记载,因此,墓志资料可以对一些历史事件进行佐证、补充或纠正,这就是墓志的证史、补史、纠史作用,故越来越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近一个世纪以来,根据墓志资料补充、写成的大部头学术论著层出不穷。

1925年,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概念,就是将传世文献与地下出土新资料相结合,来进行学术研究。此后,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又加以发扬光大。“二重证据法”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和考据学的重大革新。后来又有人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提出“三重证据法”,这就是墓志等金石资料在史学研究方面的重要作用。

史书中虽记载孝文帝葬在洛阳以西的长陵,但哪个是长陵,长期不为人知。1946年2月,《北魏文昭皇后高照容墓志》出土,根据墓志上记载的“附高祖长陵之右”,谜团终于解开,该墓志所说的小冢东南的大家,就是孝文帝的长陵。出土墓志之作用略见一斑。



《范纯礼妻扶风马氏墓志》局部



《唐郭虚己墓志》局部

在书法艺术方面,墓志石刻的作用,也早已被先贤重视。

书法界存在“碑学”与“帖学”两大体系。自王羲之之后,特别是自唐代颜、欧、褚、虞之后,千余年来,帖学一统天下,逐渐形成了柔靡书风。清代学者、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包世臣,开始大力提倡碑学,其主要历史功绩在于通过书论《艺舟双楫》一书等推介碑学,对清代中后期书风的变革影响很大,至今为书法界称颂。

之后,康有为、于右任等人极力倡导。康有为于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所著的《广艺舟双楫》,是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总结碑学的一部著作,提出“尊碑”之说,大力推崇汉魏六朝碑学,对碑派书法的兴盛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近百年来,碑学被重视程度之高,世人自有目共睹。

墓志文的书体有一个演变过程。以墓志形成初期的北魏墓志来说,此种书体正处于由隶书向楷体演变的过渡阶段,书法艺术独具特色,颇受人们的宠爱。到唐代,这个演变逐渐完成,楷书遂占据了绝对优势,也为以后历代所承继。

隶书书写的墓志在整个墓志总数中占比很

小,由于数量少,也颇受青睐。整篇篆书书写的墓志极少,北宋宰相范仲淹的儿媳《范纯礼妻扶风马氏墓志》,就是这类难得一见者。由于墓志是一种肃穆的充满敬意的悼念性载体,所以,整篇为草书的墓志未见面世。有时,一篇墓志文夹杂多种书体,当然,大致还是以楷书为主。墓志盖上的字体,基本为篆书与行楷,篆书数量略占上风。

不少墓志文是由名人撰文或书丹的,因此备受后人推崇。如1997年出土于洛阳偃师的《唐郭虚己墓志》,是由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撰文并书丹的。所以,它已成为国宝级文物,自然也成了偃师商城博物馆镇馆之宝。再如1999年出土于洛阳伊川万安山南麓的《唐张说墓志》,现藏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由张九龄撰文。二张都是著名政治家、宰相、文学家,该墓志的价值自不待言。洛阳九朝刻石文字博物馆所藏《唐唐惟贞墓志》,由书法世家徐浩撰书,作于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十一月末,较著名的《不空禅师碑》还晚半个月,距徐浩去世仅五个月,是至今所知他的最晚书迹,故在书法史上意义极其重大。这些墓志拓本,皆是一纸难求。

墓志文刻到石头上,一般有几种方式。一种是将墓志文布局好,书写到石头上,再由专门石匠雕刻而成;第二种是将书写好的墓志文纸张铺在石头上,再用一些特殊材料将文字印在石头上,然后刻字;第三种是直接刻字上石,这一类一般文字很少。也许还有其他的途径,我们还不清楚。

从古至今,书法艺术一直受到众人的喜爱。学习书法,临帖是必不可缺的。帖从何来?传世的帖子如凤毛麟角,且有些未必就是真品,可能经过二传手、三传手。墓志千年深埋于地下,有些墓志出土时如同新作,以此制作出来的宣纸拓本极其漂亮,摄人心魄,名家撰写的墓志,常被印制成本字帖,供世人欣赏临摹。

要想更清楚地看到或者长期保存墓志及墓志纹饰图案,最理想的办法就是制作拓本。拓本制作是一门历史悠久的传统工艺,大约产生于南朝时期,对后来印刷术的诞生起到了启迪作用。宋人王说《唐语林》载,颜真卿任平原太守时,曾自撰三通碑文并让人刻石,未及立而“安史之乱”爆发,平乱之后,平原别驾吴子晁将碑制成拓本,寄给在抚州任职的颜真卿。

拓本制作方法各异,大致是将宣纸处理,平铺于石头上,再用墨包捶打石头,石头上的文字及图案就会留在纸上。所用宣纸有湿有干,捶打方式也有上下捶打,是为捶拓,也有前后或左右轻擦纸面,称为擦拓。还有一种方法称称拓,又叫全形拓。

不少墓志制作精美,常常在墓志底及墓志盖的四条雕刻各种花纹图案,如云纹、卷草纹、龙凤纹等,图案有拟人化的十二生肖、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八卦图等。这些图案往往线条刻画精细,栩栩如生、动感十足、赏心悦目,无疑成了美术工作者的最爱。

扫一扫,关注“人文河洛”(renwenheluo)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人文河洛”系《洛阳日报》品牌之一,让我们在这里触摸河洛大地的人文底蕴,感受洛阳历史的厚重魅力。

洛阳·视界



向阿拉德孔子课堂赠送的《牡丹相约一带一路》剪纸作品



一家三口的“牡丹笑脸”

“牡丹笑脸”走进罗马尼亚

初夏5月的南欧巴尔干半岛,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应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艺术家摄影协会和阿拉德摄影俱乐部的邀请,本报记者、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市摄影家协会主席高均海于20日至26日在该国两市进行了文化交流。

高均海作为“牡丹笑脸”活动的发起人,近年一直致力于丝绸之路和牡丹文化的传播。在罗马尼亚四所孔子学院之一的克鲁日巴巴什波雅依孔子学院的阿拉德孔子课堂,他向罗马尼亚学生介绍了国色天香的牡丹和古都洛阳的悠久历史,向师生们赠送了由我市省级非遗传承人杨杨创作的《牡丹相约一带一路》大幅剪纸作品和牡丹文化衫,学生们纷纷手捧

牡丹拍下了一张张笑脸。高均海一行特意走访了罗马尼亚的“中国之家”,受到了负责人丽奇卡·米胡茨博土热情欢迎,这位充满激情的老人退休前曾在罗马尼亚众议院担任重要职务,曾经是阿拉德一所大学的校长。4年前,她在自己家中办起了罗马尼亚“中国之家”,专门从事增进中罗两国友谊的事业。

令人称奇的是,本报记者在走访当地多家博物馆的过程中,一家博物馆的负责人向本报记者展示了她收藏的中国著名画家的作品,其中齐白石的几幅作品尤为珍贵。这位负责人说,这些画作都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有关部门在这里举行展览后他收购的。

本报记者 文/图



当地博物馆工作人员的“牡丹笑脸”



向当地官员赠送洛阳牡丹真花艺术品